

孔子作《左传》说源流考

黄觉弘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作者简介] 黄觉弘(1970-), 男, 湖北石首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先秦汉魏文献与文学研究。

[摘要] 孔子作《左传》说当首先缘起于清康熙年间张沐的《春秋疏略》。清人许伯政《春秋深》承绪张沐之说并恢扩之。近世顾路柏《中国文学史》、章太炎《检论》卷二《春秋故言》及毛起《春秋总论初稿》等并有流行。

[关键词] 孔子;《左传》;张沐;许伯政;顾路柏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5-0653-05

《左传》的成书时代与作者问题, 两千多年来学者们议论迭出, 孔子作《左传》说就是纷纭众说之中比较特异的一种, 但历来似不为考论《春秋》经传学者所知悉, 故而几次出现“首先提出”的误讹。笔者曾对此说情形稍作提示, 但语焉不详^[1](第7-10页), 故本文拟详加考述, 以明其来龙去脉及其分合异同。

一、孔子作《左传》说之缘起

考源溯流, 孔子作《左传》说当首先缘起于清康熙年间张沐的《春秋疏略》。张沐(1631—1713), 字仲诚, 号起庵, 河南上蔡人。事详《清史稿》卷476《循吏传一》。顺治十五年进士。康熙元年后, 历任直隶内黄知县、四川资阳知县, 后以老乞休。年83卒。张沐著述颇丰, 有《五经四书疏略》, 共九书合144卷。此外, 还有《溯流史学钞》20卷, 《图书秘典一隅解》一卷。张沐在当时颇有声名。《清史稿·梅文鼎传》载: “圣祖西巡, 问隐沦之士, 光地以关中李颙、河南张沐及文鼎三人对。”^[2](第13948页) 其交游甚广, 又曾先后主讲登封、禹州、汝南、开封书院, 门弟甚多, 形成了出于王阳明而兼取程朱的“起庵学派”。张沐治学, 胆大而多臆断, 因而四库馆臣曾屡加批驳。如《周易疏略》以《河图》、《洛书》及伏羲、文王诸图即所谓“今本九图为孔子所定”, 四库馆臣说: “沐自谓朱子之所不能解者, 绎诸孔训, 恍然来告, 敢曰独信, 亦谈何容易乎!”^[3](第72页) 在《春秋》经传学上, 张沐表现得尤为大胆, 提出了被四库馆臣讥叹为“异哉斯言! 自有经籍以来, 未之闻也”^[3](第254页) 的孔子作《左传》说。

当时有兰陵人王渭对《春秋》、《左传》的作者问题曾久惑于心。王渭认为, 如果只以《春秋》经文求其大义所在, 则全无考据, 必须参详《左传》之文方可奏效。《春秋》经文若无美恶昭然, 小大不遗的《左传》之文相辅, 则事之本末不明, 读者亦无由定其是非功罪。所以, 《春秋》不能舍《左传》而自明其实。“窃怪圣人既号作《春秋》, 何以必待后人作传而始明。设无此传, 圣经不虚作乎? 设无左氏, 圣人将谁待乎? 然则左氏何人, 乃有此翼成圣经之学。意左氏必与圣人同时, 共事, 然后可也。而作传□又在孔子既卒之后, 必非鲁论中之左丘明, 而别有左氏, 然后可也。此皆千古大疑而不能自释于中者也。”^[4](第292页) 后来, 王渭持所疑请教于张沐, 张沐以孔子作《左传》说相答。王渭深以为然, 于是力赞张沐撰辑成书, 并

参以校订之役,“二载而疏略稿成”。这即是《春秋疏略》五十卷。此书见著于《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今有康熙十四年至四十年著蔡张氏刊本。1997年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32册。

张沐立说之理由主要有二。其一,张沐认为,孔子劝善惩恶的素王大法,以《春秋》、《左传》最为深切著明。《春秋》有《左传》而后为《经》,无《左传》则鲁史而已,不足以为《经》。鲁君臣以《春秋》自省自治或有余,但不足以告之天下万世以为常道。因为鲁史之体,记载内事多忌讳,记载外事则凭乎赴告,孔子不能变易其文。“多忌讳则无以示后世而为经,凭赴告则所载失真,亦无以垂世戒而为经。”^[4](第292页)孔子有鉴于此,“于是广□博访,采其实事,附于经文之左,谓之《左传》”^[4](第292页),经所微者,为之显之。经所略者,为之详之。“则龇突者明,忌讳者显。有目者见之,心动神悚,善恶犹已出焉,福祸犹身受焉,不容不惩且劝,久之化也。”^[4](第294页)这样《春秋》乃成为《经》。再者,《春秋》有“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所谓五例,这五例均待《左传》而后明,因此非孔子不能成此深醇至极的《左传》。“董子所谓托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合经与传而始成《春秋》,则《左传》岂为左氏之书乎?”^[4](第293页)

其二,《左传》成书之史料来之不易,乃孔子周游列国,费尽心力,广采博收,然后可成。左丘明则非其人也。张沐说:

昔孔子去鲁,以甚盛德,携诸大贤,十五年周流辙环,遍交于列国之君臣上下,得尽闻古今载籍,佚文漏章及野史与父老口说。凡政治得失、风俗美恶、人类贤邪之故,心术诚伪之态,细及妇人女子之隐情,以及鬼神妖梦之奇、卜筮之法,日与门弟子策记弗忘,以学聚而问辩之,宽居而仁行之。……及归鲁,时穷道丧,欲以此学垂教天下万世以为常道。……于是取鲁史为经,而以不可为经者,挨年顺月,附录经左,命之曰《左传》,借《经》而传焉。庶几天下后世变化之情理,不外于斯。而斯人之聪明亦尽启于斯矣。若左丘明非甚盛德,又不曾周流辙环,携诸高弟,十四五年来访于外,岂能凭虚而撰之?况作传有厚意哉。^[4](第294页)

张沐在其他著述中也有此说的表露回应之笔,如四库馆臣批评其《书经疏略》说:

又所载孔安国《序》,于《春秋左氏传》句阙其“左氏”二字,解之曰:“《传》附《经》左曰《左传》。以人号传,古无此体。”考《左传》或曰《左氏》,或曰《左丘》,汉以来说者不同,总为人姓。沐乃以为左右之左,殊骇视听。且谓传以人号,古无此体,是并《汉艺文志》亦未见矣。盖沐著《春秋疏略》,以《左传》为孔子作,故于此书亦护其说耳^[3](第114页)。

可见张沐的孔子作《左传》说系统贯穿在他的学术著述中,并不是一时随谈。张沐“诲导不倦”,“两河之士翕然归之”^[2](第12973页),门徒甚众,习闻其说者当不乏人。但由于此说骇于物听,信者恐无多,故其似存若亡可知。

二、许伯政《春秋深》之推详

乾隆年间,许伯政著《春秋深》22卷并首二卷,始又承绪张沐之说而恢扩之。许伯政字惠棠,巴陵人。乾隆壬戌进士,官山东道监察御史。许氏精天文,有《全史日至源流》33卷,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又有《易深》8卷、《诗深》26卷。许氏治学与张沐近似,喜立新说,而证据往往不足。如《易深》八卷,“所论有合有离,不能一一精确也。”^[3](第85页)《诗深》26卷,“多所攻难,而所立异义不能皆有根据。”^[3](第148页)

许氏《春秋深》首卷上《春秋三传得失辨》详细论证了孔子作《左传》(许氏时又称为《春秋本传》)说。四库馆臣曾指出许氏盖踵继张沐之说而稍加“变更”^[3](第260页),但其实许氏论证已远较张沐为详,且多有发挥推阐。不过,由于《春秋深》仅以稿本流传,历来知者甚少。除《四库总目提要》卷31著录此书于存目,稍稍称及许说大旨外,后世考论《春秋》经传学者罕有称及。此书稿本今藏上海图书馆,2001年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92册,始得流传稍广。

许氏书中有直接称述张沐之说者。如“或谓经传分行,读者右经左传,非《左氏传》也”^[5](第4页),这显然是对张沐之说的称引。但许氏并不赞成此说,其谓:“此说似可通,而无所征据。况《左传》中凡所注解及论赞多与本传文意不符,明是左氏所增入。”^[5](第4页)与张沐一样,许氏也认为有经必有传,经必待传之事实方能考见其大义。因此许氏提出了“《春秋》全书”的概念。“夫孔子之作《春秋》,盖曰我欲托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者之深切著明。是圣笔所取义,即具于当时人见诸行事之中。既挈其义于经,即录其事于传。而左氏得其经,兼得其传,乃《春秋》之全书也。”^[5](第5页)《左传》(许氏时称为《春秋本传》)不但不是春秋左丘明所作,也非战国左氏所作,而是孔子自作。“圣人既因史取其义以为经,因叙次史文所载事实为传。”“挈义于经,纪事于传,俾读之者法戒,瞭然在目。”^[5](第6页)这些说法,与张沐也多近似。但许氏进一步认为:“传原与经别行,亦犹《诗》之序,《易》之十翼,皆与经别行者也。厥后公羊、谷梁但得其经,惟左氏兼得其传。……是《春秋》有三传,犹《诗》有四家,而左氏独得其本传,称曰《左传》,亦犹《毛诗》独得《诗》本序,称曰《毛诗》也。”^[5](第2页)这是许氏的新推论,比起张沐以孔子“叙次于经之左,谓之《左传》”^[4](第296-297页)的说法,要显得圆通巧妙。

许氏认为,朱子因《通鉴》以成《纲目》的方法,正是借鉴了《春秋》经传的修撰之法,以书法为纲,以史事为目。“窃思孔子适周,访礼于柱下史,则其历聘列国,凡二百四十余年事迹,博览史文,靡不睹记。及乎晚年,道终不行,乃因鲁史以成经,而集史事以为传。”^[5](第3页)《春秋》经传固为孔子所笔削,但也有游夏之徒的相助之功。“窃谓经义之笔削固非门人所能赞,若采史文所纪事实为传,则游夏之徒优为之。惟是去浮从实,必经圣人裁定之。”^[5](第2页)许氏又认为,《左传》成书后,与《春秋》别行,“经自经,传自传”^[5](第3页)。兼得孔子《春秋》经传(即所谓《春秋》全书)的左氏应是先秦人。“考之《史记》尝称河间献王修学好古,所得《尚书》、《礼记》、《毛氏诗》、《左氏传》、《孟子》皆古文先秦旧书。由是观之,左氏盖先秦间人,其传尚是古文。”^[5](第4页)左氏得到《春秋》全书后,又对《左传》有所增润,故而造成“今读之每多浮夸悖诞,与圣笔之迥不相副”^[5](第2页)的情况。“凡传文叙而不断,间有指点经意者,类皆言约旨精。至于左所增设,不但辞气浮夸,且与经之本旨,传之本意自相矛盾。”^[5](第2页)许氏认为《左传》的这种增润情况与《毛诗序》相似:

尝考《隋经籍志》云先儒相承,谓《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更加润溢。即此推之,可见《左传》中凡加注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类;又加论赞,如“君子曰”、“仲尼曰”之类,多左氏所增设。盖与毛、卫之润溢《诗序》相似。^[5](第2页)

战国之间,处士横议,好为荒唐悠渺之说。而“秦汉以来,传奇小说倚经附史,奇怪百出,皆踵其流毒”^[5](第12页),故好事者增润经史,窜附典籍,颇多臆造,类孟子所斥齐东野语者。许氏并举《左传》所述吴公子季札观乐一节以为佐证,说此节“手笔庸琐,义意空疏,盖与伪《泰誓》等耳”^[5](第13页),乃汉武帝时期之人所窜入。“又考武帝元光五年,河间献王来朝,献雅乐。所献之乐大约歌用四诗,舞称六代,而总周乐为名。当日献之汉朝,必先有援据。好事者因《左(事)[氏]》帙繁事杂,窜入其说,以为引用《诗》、《乐》之证耳。”^[5](第13页)

虽然张沐、王渭导之在前,许伯政推之在后,孔子作《左传》说还是未能为学界周知,更不可能被接受。间或有一二见闻其说,以为姑备一说不加斥难者。如赵慎畛《榆巢杂识·上卷》说:

有人言《左传》非姓左人作,因传在经左,故名“左传”。昔之论左丘明者,均无确据,此亦或备一说耶?^[9](第24页)

这已是罕见的态度了。

三、顾路柏、章太炎、毛起等人之流行

许伯政之后,再一次提出孔子作《左传》说的是德国著名汉学家威廉·顾路柏(Wilhelm Grube,又译格鲁伯,1855—1908)。顾路柏在1897年至1900年间,曾在北京从事研究工作。1902年,莱比锡阿

麦朗格斯出版社(Amelangs verlag)出版了顾路柏的《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此书在德国是影响甚大的中国文学史专著,但在中国影响不大。1926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mhard Karlgren,又译珂罗倔伦,1889—1978)《论左传之可信及其性质》(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sn,1927年陆侃如将其译为中文,以《左传真伪考》为名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曾叙述说,格鲁伯在他的《中国文学史》里说《左传》也许是孔子自己作的。辛德赖(Schindler)和欧克士(Erkes)都信持其说。格鲁伯的理由是,孔子曾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话表明孔子希望后人拿《春秋》来评判他。所以此书当是孔子一生最大的工作。但是《春秋》不过是很朴素而干燥的文句,从鲁国国史里摘出来的,不足以当其言。格鲁伯解释这一种矛盾,说孔子并不是指《春秋》原本,而是指载事丰富而详赡的《左传》^[7](第61页)。高本汉还认为格鲁伯是最早提出孔子作《左传》说的,盖不知清人张沐、许伯政已导夫先路。

1914年,章太炎(1869—1936)将《榘书》增删改订,定名为《检论》。其卷二《春秋故言》提出了“《经》有丘明所作者矣”^[8](第410页),“《传》亦兼仲尼作也”^[8](第411页)的“经传兼作”说。章太炎认为,当时史官皆自周出,而诸侯史记当归王官,不可私藏。孔子是在太史左丘明襄助下修成《春秋》的,而左丘明又是得孔子“圣论”下修成《左传》的。“《经》、《传》相依,年事相系,故为百世史官宗主。”^[8](第412页)他说:

自孔子以鲁故臣,依大史丘明为主,而修《春秋》。……故夫笔削之事,游、夏不能赞一辞,而丘明佐书焉。《经》有丘明所作者矣。《传》文时举卫赐繁纓,晋铸刑书,郑献陈捷,纥郤齐田,嫪戮竖牛,胙数鬻狱,侨存乡校,诸事不见于《经》者,而称圣论定其是非,明诸所录事状,获麟以上,皆造膝受意焉。故《传》亦兼仲尼作也。此其为书,犹谈、迁之记,彪、固之书,父子戮力,丸揉不分。……后代所题,《经》称仲尼,《传》称丘明,徒以著于竹帛字纵笔迹之所发者,则据为主名耳。^[8](第406—411页)

章太炎虽不认为《左传》即为孔子所作,但认为《左传》成书与孔子有密切关系。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传》都同时兼得二人修撰。不过,这种兼作,显然仍有其主次之分。《春秋》以孔子为主,左丘明为辅。《左传》则以左丘明为主,兼取孔子“圣论定其是非”。因此章太炎的“经传兼作”说虽与孔子作《左传》说有同,但更多的是异。

近人毛起亦有孔子作《左传》说。毛起(1899—1961),原名宗翰,字无止,又字禹州,浙江舟山人。其说见于1935年由苏州贞社出版的《春秋总论初稿》。严格说起来,毛起申持的是孔子作《春秋传》(包括《左传》)说。毛起曾游学欧美,后转历国内诸所大学教授,但似不曾见及顾路柏、章太炎此类之说。毛起写于1934年12月的《春秋总论初稿·序二》曾自述他1925年11月突悟此说的过程。毛起认为,《春秋》是鲁史,孔子作《春秋》是作其传。《鲁春秋》终于顷公,而今本《左传》之经终哀十六年是孔子作传时之录自鲁史的^[9](第39—70页)。毛起说:

但孟子又何以口口声声说孔子作《春秋》,作了《春秋》,又是如何如何呢?他的话一定不是谎话,你又将如何说明来?我们以为孟子此言,是指孔子作《春秋》之传而言的。所谓孔子之《春秋》是传,而鲁之《春秋》则是今之经文也。这个经传名称之不别,乃是秦汉以上之习惯,极其通行的。^[9](第27页)

毛起并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里的一段话作了比较新颖别致的解释:

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叙》里说:“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次《春秋》,……制义法。……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七十子之徒到了后来,将其口说相传的传指著于竹帛。那竹帛里所著之言,无论怎样改形,一定是有孔子之言在内的;叫他为孔子之传,有何不可?这好比一个听演讲的人,将其所听到的话记录下来,发表出去,我们还可以他为是演讲者之作品一样。^[9](第29页)

这种解释比许伯政的左氏兼得孔子《春秋》经传的解释或许还要圆通些,与章太炎的“经传兼作”说也有相通之处。毛起并不遽然认定《春秋》三传就是孔子所作。他认为三传还是各有其作者的,“作者

们在著竹帛之时候,曾将己意参入进去;所以传内不是纯是孔子之言了。”^[9](第71页)毛起还认为,现传《左传》并非原本,其中有后师的附益增窜,但不是刘歆而是东汉贾逵的附益增窜。但毛起又借鉴康有为《左传》、《国语》原本一书的说法,推测《左传》成书过程,说:“我们也以为《左传》是从《国语》分出来的。但不是从原本的《国语》分出,而是从《新国语》分出的。而《新国语》,则又自《国语》原本分出的。”^[9](第114页)“我们以为《左氏春秋》就是《国语》”^[9](第117页)。果如毛起之说,《左传》分合如此辗转多变,其中固然保存一些孔子之言,但显然已非演讲与演讲记录之关系,绝不当谓“孔子作《春秋》之传”了。

毛起《春秋总论初稿》之后,几历60年,孔子作《左传》说不见持论者。自1993年以来,又有姚曼波者开始发表多篇论文,并出版《春秋考论》一书,重提此说。姚氏自道是“全新的探索”^[10](第5页)。姚氏认为,孔子所作《春秋》,不是前人所说的《春秋经》,而是一部独立的著作,是今之《左传》的蓝本。这个《孔子春秋》是记载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史实的类似纪事本末体的一部史学著作。后来左氏割裂孔子《春秋》,加入逐条解经语而形成编年体《左传》^[10](第5页)。姚氏盖不知张沐、许伯政、顾路柏、毛起诸说在前,而其立论根据和证述时有与之类同者。如姚氏关于《孟子》称引孔子《春秋》的说法即与毛起之说很相似^[10](第42-52页)。再如姚氏详论的“《左传》的史实部分,不仅是孔子所书,而且其史料,也是孔子游历各国所亲自搜集”^[10](第281页)的说法,也与张沐、许伯政、毛起之说颇为相似。因二者取旨大同,故其考证论述多所暗合,亦不得不合耳。

[参 考 文 献]

- [1] 黄觉弘. 孔子作《春秋传》说辨议[J]. 聊城大学学报, 2004(3).
- [2] 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3]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4] 张沐. 春秋疏略[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5] 许伯政. 春秋深[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 济南: 齐鲁书社, 2001.
- [6] 赵慎畛. 榆巢杂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7] [瑞典]高本汉. 左传真伪考及其他[M]. 陆侃如,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 [8] 章太炎. 检论[M]. 章太炎全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 [9] 毛起. 春秋总论初稿[M]. 苏州: 贞社, 1935.
- [10] 姚曼波. 春秋考论[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何坤翁)

Statement of Confucius Writing Zuo Zhuan

HUANG Jueh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Jiangsu, China)

Biography: HUANG Juehong (1970-), male,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Jiangn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pre-Qing, Han, Wei Dynasties'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statement of Confucius wrote Zuo Zhuan appeared in Zhang Mu's Chunqiu Shulue in Qing Dynasty at first. Xu Bozheng's Chunqiu Shen give play to some extent. Wilhelm Grube's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Zhang Taiyan's Examines Discusses, and Mao Qi's Chunqiu Zonglun Chugao have some argumentations.

Key words: Confucius; Zuo Zhuan; Zhang Mu; Xu Bozheng; Wilhelm Grube